

#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社会学意义<sup>\*</sup>

## ——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郑 震

**提要：**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无意识特征的基础性的层次，它饱受由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和官僚统治制度所带来的异化之苦，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它日益经受着语言和符号的霸权，而它所包含的空间生产则使资本主义得以存续，但解放的可能性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推动了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但其异化和总体人的思想依然没有摆脱人道主义乌托邦理念的困扰，因此，一门为社会学奠定基础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必须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从日常生活的自相矛盾中寻找批判的切入点。

**关键词：**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 一、引 论

对于社会学而言，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纵观社会学的历史，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的观察、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戈夫曼的日常生活“戏剧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乃至埃利亚斯、布迪厄、布希亚、德赛托（Michel de Certeau）、福柯等人笔下的日常生活研究，日常生活从来就没有游离出社会学的视野。但由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所主导的主流社会学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加以关注，日常生活研究长期处于社会学的边缘，社会学的主流或者迷恋于对客观普遍的社会法则的探究（如实证主义者），或者倾心于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系统功能的探讨（如结构功能主义者），这两种倾向在具体的研究者身上更多的则是不同程度地混合在一起，总之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忽视或无视日常生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将日常生活贬低为次要的、从属的、微观的、琐碎的、

---

<sup>\*</sup>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潮研究”（10YJC840098）的阶段成果。

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从 20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埃利亚斯、布迪厄、布希亚、德赛托、福柯、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理论家们共同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推上了主流社会学的历史舞台，这一方面体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以所谓的“消费社会”的兴起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转型对思想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埃利亚斯也许是一个例外，他有关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早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发表，但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研究才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这一转型直接将消费所蕴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推到了理论思考的前沿；另一方面，伴随着实证主义的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范式在解决诸多问题方面的捉襟见肘并陷入危机，在社会学和哲学领域中早已缓慢孕育的各种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在哲学方面，胡塞尔晚年的生活世界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实践理论等等都为日常生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呼应，对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激发和推动的作用。

在诸多影响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转向的思想家中，法国 20 世纪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确是十分独特和重要的一位。他不仅早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推出了他的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从而确立了他的先驱地位，更重要的是他还直接参与了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日常生活转向，他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相继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第 2 卷：日常社会学的基础》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著作便直接参与了这一视角的转向。有关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无疑十分复杂，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视为是将各种彼此矛盾的理论倾向加以综合的一种并不完美的尝试。列斐伏尔一生致力于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并且始终热衷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改造和超越；他深受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双重影响，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的思路，主张异化理论和总体人（total man）的观念，可以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化的（海默尔，2008：196）；他尽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的解放政治却充斥着尼采式的身体主体式的酒神反抗（刘怀玉，2006：33）和带有酒神精神和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节日狂欢（海默尔，2008：196）。我们并不打算在此详尽地讨论列斐伏尔的各种思想来源（我们将在后文结合具体的论题进一步地讨论这一问题），但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对社会变革和思想发展始

始终保持敏感和开放的作者，列斐伏尔的著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他在前后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陆续出版的三卷本《日常生活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自我调整和改造的结果。与此同时，诸如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等各种 20 世纪的理论思潮在列斐伏尔的著作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呈现，当然列斐伏尔对待它们的态度往往大相径庭。事实上，也正是列斐伏尔的这种对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开放精神使他能够直接参与到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之中。

可以说把列斐伏尔放在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这一议题下来讨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不仅深刻影响和参与了这一转向，而且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具有一种总体化的意图，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并不试图成为一个新的专门化，或者一个独特的社会学分支。它正在从事的是对总体的一个总体的批判”（Lefebvre, 2002: 27）。因此，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日常生活批判绝非只是要在社会中划分出一个专门的日常生活领域来加以研究，并以此在众多的社会学分支中增加一门分支性的日常生活社会学，相反列斐伏尔试图在总体上将社会学的视角日常生活化，社会学必须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因为日常生活对列斐伏尔看来绝非只是许多人眼中的一种无足轻重的社会现象。这一总体化的立场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已经在当代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中得到了深切的呼应，它为社会学带来了一场视角的革命，对其意义的追问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本文正是试图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研究对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问题意识，通过与列斐伏尔思想的对话来深入地挖掘日常生活社会学的时代议题及其可能的思路。当然，我们并非要武断地用列斐伏尔的理论去诊断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对列斐伏尔的研究并非是、也不可能是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试图在与列斐伏尔思想的碰撞中探索一种迂回的路径。

## 二、日常生活作为“层次（level）”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写道：“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将把人

（现实的和可能的）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之间的分离作为它的主要目标，并且将暗示一种**日常生活的复兴**”（Lefebvre, 1991a:127）。此刻真正的现实和真正的变革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深处（Lefebvre, 1991a:137）。这是一种蕴含着对前现代社会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日常生活概念，它对所谓的真正的人的想象在列斐伏尔有关“农民共同体”的理想主义描绘中得以模糊地呈现出来：“在他的现实中，他实践并实现了他的所有潜能。感到与其自身没有深刻的矛盾，他可以沉溺于他自己的自发的生命力（在那个作为农民共同体的崇高的平衡状态中）。他自身、他的活力、他的天性的所有方面都获得了发挥。也许他是基本的和初步的，但至少他没有生活在被根本‘压抑’的状态中；并且也许他有时会满足地死去”（Lefebvre, 1991a: 207）。这种理想化的状态连列斐伏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只是在历史上的很少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成功的、快乐的、平衡的形式（Lefebvre, 1991a: 207）。列斐伏尔认为，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观念中的最高等和最伟大的方面是融为一体的（Lefebvre, 2002: 321），这是人性化得以在其中实现的日常生活，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人道主义预设列斐伏尔这里转化成了对前现代日常生活的人道主义想象。然而这个理想化的日常生活的平衡形式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被破坏了，日常生活的异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异化问题）。不过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中列斐伏尔不再局限于或者说不再仅仅强调这个前现代的日常生活概念（事实上第一卷本身就已经以一种含混矛盾的方式包含了后来的单调乏味的机器般的有节奏的日常生活概念，只不过它还处于含混和从属的地位[刘怀玉, 2006: 186—87]。），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可以被界定为总体中的社会实践的一个层次”（Lefebvre, 2002: 31）。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与诸如哲学、艺术、宗教、科学、政治等高等的文化活动日益分化开来，它们构成了社会总体中的不同层次，尽管不同层次之间是不可能完全脱离联系的，它们能够相互作用和彼此重叠，一个层次可以成为另一个层次的中介，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层次还能够支配和吸纳其他的层次（Lefebvre, 2002: 119）。

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不再与高等文化观念融为一体，而是转变为与后者相分化却不分离的一个层次，其关键就在于现代社会的高等文化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发展使之日益远离日常生活

(Lefebvre, 2002: 51)。这一分化 (distinction) 造就了现代日常生活这一基础性的层面, 虽然它丧失了传统社会中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但是它作为层次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人类世界不仅仅由历史、文化、总体或作为整体的社会, 或由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界定。它是由这个居间的和中介的**层次**: 日常生活所界定的。在其中可以看到最具体的辩证运动: 需要和欲望, 快乐和快乐的缺失, 满足和欠缺 (或挫折), 实现和空的空间, 工作和非工作。日常的反复的部分 (在此术语的机械的意义上) 和创造的部分被卷入到一个不断重新恢复活动的线路之中, 这一卷入的方式只有辩证的分析才能够加以领会” (Lefebvre, 2002: 45)。由此可见, 日常生活虽然处于较低的层面, 但是这恰恰指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和中介性, 它是实践中的基本的实践, 而实践 (praxis) 对列斐伏尔而言就是行动中的总体的等价物, 它包含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Lefebvre, 2002: 45)。的确在列斐伏尔看来, 现代日常生活是那些可以外在于日常生活、甚至可以批判日常生活的高级、分化的、高度专门化的活动得以生成的肥沃土壤或者说基础 (base) (Lefebvre, 1991a: 85, 86, 87; Lefebvre, 2005: 41、57、123), 它们正是来源于日常实践, 是日常实践这个一切活动的共同基础的最高表现。在此, 日常生活被理解为遍布一切人类活动领域的基础性的层次, 将人类塑造为一个整体的全部关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成形 (Lefebvre, 1991a: 97)。可见日常生活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子系统, 它与社会总体的关系自然也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部分和总体的关系, 日常生活是遍布整个社会的具有生成力和活动力的基础层次。事实上整个生产方式正是从日常生活出发努力将其自身建构为一个系统 (Lefebvre, 2005: 41)。列斐伏尔认为,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国家所确保的社会管理不再让社会关系、市场和盲目的力量顺其自然的发展, 实际上在主要的冲突和事件的过程中, 统治关系及其再生产已经夺取了对于生产关系的优先性, 这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还原论的和不完全的 (Lefebvre, 2005: 123)。而“国家现在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 它的基础是日常” (Lefebvre, 2005: 123)。列斐伏尔反对将马克思视为是经济决定论者, 他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 在其中经济因素具有优势地位, 然而今天日常生活已经取代了经济因素的地位 (Lefebvre, 1984: 197)。并且日常生活以其自身的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Lefebvre, 2005: 123) (它当然并不局限于

此种关系)。由此列斐伏尔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他甚至在其由《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所开启的中后期思想中根本解构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决定论（刘怀玉，2006：240），完成了从物质生产主导向符号消费主导的转向。这一转向显然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消费社会”的兴起而做出的，列斐伏尔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潮转向中的积极的一员，他将其研究的重心转移至语言、符号和消费的领域（我们将在第四节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日常生活成为一个语言所统治的世界（Lefebvre, 1984: 118、119、120、121、139）。在列斐伏尔看来，诸如媒介、广告和出版社这些符号的生产者和操纵者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狡诈的规划，此刻符号与消费充斥着日常生活，“没有哪个个别的特征——消费本身、景观（spectacle）和景观化（spectacularization）、对形象的滥用、信息的压倒性的丰裕和过剩——足以去界定这个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日常生活中”（Lefebvre, 2005: 26）。让我们以信息为例进一步地阐明列斐伏尔的立场，在列斐伏尔看来信息并不只是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交换的商品，这意味着它跨越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分法，它作为商品并不具有物质形态，但它又是如此重要的商品，以至于它具有导致所有其他商品被买卖的独特特征（Lefebvre, 2005: 144）。而信息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它所承载的符号法则和消费意义构成了一种支配性的力量。

尽管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尖锐的分歧，但是列斐伏尔将现代日常生活理解为基础性的社会层次的观点却与现象学有关奠基性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产生了遥远的共鸣，这一共鸣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20世纪西方的不同思潮在思考社会现实和反思笛卡尔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视角共同触及了社会生存的隐蔽基础（当然现象学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并不陌生，例如他显然对海德格尔这位重要的现象学家十分熟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摆脱了笛卡尔的理智主义、意识哲学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困扰（它们各自对待笛卡尔主义的方式也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确指出了包括理论实践在内的一切实践都必须以一个奠基性的、非主题的、主观相对的直

观的生活世界为前提（胡塞尔，2001：151—52、172、176、565）。<sup>①</sup>虽然胡塞尔错误地将他自己的先验现象学排除在外（胡塞尔，2001：220；郑震，2009：115—116），从而暴露了他的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立场（郑震，2009：116），虽然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还原并没有摆脱笛卡尔的主体主义的统治（郑震，2009：120），但是前反思的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客观上无疑为打破笛卡尔的理智的意识主体的统治开辟了一条连它的提出者也没有意识到的宽广道路，胡塞尔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条他用于建设其先验现象学的道路预示了他的先验现象学的破产。与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视为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信念（doxa）的世界有所不同，列斐伏尔笔下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需要和欲望，快乐和快乐的缺失，满足和欠缺等等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同样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但是它却充满了辩证的矛盾和张力，列斐伏尔明确指出：“无意识仅仅是意识无视它自己的规律（或结构），并且就这一点来说日常生活确实是现代性的无意识”（Lefebvre, 1984: 117）。<sup>②</sup>与强调生活世界的自明性（胡塞尔，2001：151—52）从而缺乏批判立场的相对保守的胡塞尔相比，列斐伏尔的无意识理论正是要声讨那个掩盖了矛盾、张力和压迫的现代社会，这一无意识状态使得人们无视日常生活的恐怖，列斐伏尔笔下的日常生活世界显然并非胡塞尔意义上的自明的生活世界，它的异化特征需要批判的鞭挞。

### 三、日常生活的异化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指出：“异化理论和‘总体人’理论依然是日常生活批判背后的驱动力”（Lefebvre, 1991a: 76）。这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论显然受到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影响。总体人的概念无疑为异化理论提供了批判的规范基础，就这一概念的表面含义而言，它无疑意味着一种非

---

<sup>①</sup> 在此我们仅以胡塞尔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为例，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来代表整个现象学思潮的生活世界理论，实际上像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这样的现象学家的生活世界理论与胡塞尔的理论之间有着诸多的差异（参阅郑震，2009：第5章）。

<sup>②</sup>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胡塞尔肯定生活世界的纯粹意识构造的特征，但胡塞尔否认生活世界是一个“目的构成物”（胡塞尔，2001：558）这一点，为对生活世界的前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解释留下了空间。

异化的普遍的本真主体性——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也就是历史的终结（海默尔，2008：196、210），换句话说它充当着异化理论的人道主义前设，并且暗示了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然而，列斐伏尔显然无意于以总体人的概念来预言未来，相反他告诫人们要警惕地使用异化和总体人的观念，要避免像传统哲学那样赋予它们一种本体论的意义（Lefebvre, 1991a: 76、77）。更重要的是，列斐伏尔拒绝给出有关总体人的明确的规范性陈述，他拒绝给出有关非异化的终极评价，相反任何对异化的超越都可能再次陷入新的异化之中（Lefebvre, 2002: 351、352），在超越异化的问题上列斐伏尔所主张的是不确定的必然性或必然的可能性（我们将在第六节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可能性的假设已经否定了绝对历史的宿命论，而可能性的实现并不意味着永恒的非异化，这种观点和黑格尔式的总体性思想显然是不协调的（海默尔，2008：210、211）。

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列斐伏尔展开了他有关日常生活异化的思考。正如我们在上节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仅仅是社会总体的一个层次，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和高等文化观念相分化。在列斐伏尔看来，分化出来的高等文化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异化形式，尽管它体现了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和成功的获取“非异化”的企图（Lefebvre, 1991a: 85、86），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去批判甚至超越那个异化了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本身的异化正在污染着那些奠基于日常生活的高等文化（Lefebvre, 2002: 339）。虽然日常生活的异化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无疑是其批判理论所要批判的重要对象，但是列斐伏尔对待异化的态度并非是非辩证的简单拒绝，事实上在他看来异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种辩证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的不断增长着的实现（fulfilment）与不断增长的异化是相互内在和相互凭借的，所以人正是借助异化、在异化中并凭借异化这个他的对立面，而获得了他自己的现实，创造了他自身，这个异化就是非人（the inhuman）（Lefebvre, 1991a: 58、170）。对列斐伏尔而言，这个“非人”其实就是人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和外化（externalization）的运动（Lefebvre, 1991a:58、71），这里表面上是在黑格尔的隐性批判的总体性辩证法的框架中谈论异化和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而实质上则是包含了青年马克思的鲜明的批判立场，从而既肯定了异化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中性意义（不仅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

①), 又明确地指出, 人们借助于非人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异化的世界, 它蕴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包含着非人性化的特征, 这一点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无疑发展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 (Lefebvre, 1991a: 170)。

虽然列斐伏尔是在黑格尔化了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影响下展开其日常生活批判的异化研究的, 但是列斐伏尔并没有将他的异化理论仅仅局限于生产劳动领域, 在我们前文所揭示的列斐伏尔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上, 异化是一个遍布于整个现代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问题 (刘怀玉, 2006: 138)。异化问题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问题, 而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异化的根源则是工具理性所主导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化以及相伴随的社会不平等。列斐伏尔明确指出: “人的理性仅仅显现为一个可怕的、冷漠的、非人化的理性: 科学的暴行” (Lefebvre, 1991a: 243)。由现代技术和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工业文明极大地破坏了日常生活的传统形态, 这一破坏的非人性化的特征以如下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日常生活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消失, 但是日常生活的确经历了变革, 它已经丧失了它那弥漫于整体之中的丰富性, 它的非人化和单调乏味暗示了它不再是富有潜在主体性的主体, 它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客体” (Lefebvre, 1984: 59—60)。换句话说, 工具理性及其所主导的现代技术和社会制度始终以异化的方式去剥夺日常生活的权力, 无视它的生产的和创造的潜能, 完全地贬低它, 并将其窒息在意识形态的伪造的魔力之下 (Lefebvre, 1984: 33)。<sup>②</sup>让我们以列斐伏尔所突出强调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分这一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来进一步地加以阐明。列斐伏尔认为,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对象的技术化和机械化将个人存在卷入到技术之中, 它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同一性和封闭性, 这种私人领域的私人化和同一化 (如家庭浴室取代公共浴室) 将“私人的”与“公共的”区分开来 (Lefebvre, 2005: 61)。尽管一些现代技术手段如收音机和电视机使私人可以在家里获得大量的关于公共生活的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并不是真正的知识, 它们也没有赋予个体对于事物的权力, 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实际地参与到公共的事件之中, 人们因此而

---

<sup>①</sup> 列斐伏尔将苏联和美国做了如下的比较 (Lefebvre, 2002: 230): 双方都忽视了日常生活并使之陷于迟滞状态, 美国的问题是“公共服务”不足, 而苏联的问题是优先考虑重工业, 前者是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匮乏, 后者则是过剩。

<sup>②</sup> 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一种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日常生活已经产生。我们将在第六节讨论这一问题。

无力的，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虚假的意识、准知识和非参与（Lefebvre, 2002: 90）。所谓的“私人的”依然处于一种匮乏的状态，而那些普通人一旦相信他们拥有了关于公共世界的知识（如政治往往凭借媒体等技术手段来制造那些有权的、著名的公共人物的平常表象，仿佛他们属于每一个人），他们就陷入到现代性的最为奇怪和最为恼人的异化之一之中，即私人与公共之间的鸿沟只是在表面上被克服，这种克服仅仅是一个错觉（Lefebvre, 2002: 91）。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在意识形态的欺骗中没有意识到其异化的状态，日常生活成为了现代性的无意识；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及其所主导的现代技术和政治制度正是通过此种无意识从而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和异化，它们自身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无意识状态中得以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没有在本体论上被割裂开来，从中我们并不能够得出个人（私人）与社会（公共）相分裂的本体论论断，私人与公共之间的鸿沟只能以本体论上的非二元论为基础，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鸿沟只能是一个派生的政治问题，是在包含着压迫和不平等的无意识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层面的争论，换句话说它所指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没有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有意识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并且有意识地发挥积极的影响。

尽管异化理论具有值得肯定的批判意识，但是异化理论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它只有在一个被赋予本真意义的规范化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批判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青年马克思要谈论人的类本质（马克思，2000：56、57、58），然而一旦人们意识到此种规范化的社会历史性，异化批判的合法性就将受到根本的质疑。如果本真和非本真不过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建构，那么以背离本真性来加以界定的异化也只不过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局限性的价值判断。列斐伏尔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然而他回应的方式却使他陷入到本节开头所引述的海尔默所指出的困境之中，即理论内部的不协调，这一矛盾为其自身的批判和消融提供了基础（海尔默，2008：211）。

#### 四、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

异化理论的严重缺陷并不能够遮蔽列斐伏尔思想的社会学意义，相反列斐伏尔在其异化理论的框架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日常

生活的诊断和批判依然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内涵。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法国社会的现状，列斐伏尔在反思和批判了当时所流行的各种试图为这一社会状况命名的概念之后（这些概念包括“技术社会”、“丰裕社会”、“闲暇社会”、“消费社会”等等），提出了“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这一定义。列斐伏尔认为，将当时的法国社会定义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既概括了那些流行的命名所包含的特征，同时也是科学的和更加精确的（Lefebvre, 1984: 60）。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一定义表明这个社会的理性特征或者说其合理性的限度体现在官僚统治之中（Lefebvre, 1984: 60），它表明这个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科层制为其统治机制的社会，韦伯所悲观预言的社会的官僚体制化在此似乎得到了一种回应（尽管列斐伏尔对于现代工具理性的统治不报任何希望，但是我们将在后文指出，他并没有由此得出完全悲观的结论）。而这个社会的组织对象和它建立于其上的基础则是日常生活（Lefebvre, 1984: 60），官僚统治机制正是通过控制那个为其奠定基础的日常生活来实现其统治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对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和科层化。<sup>①</sup>然而，在列斐伏尔看来，与旧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为主导向度不同的是，新资本主义社会将其统治的重点转向了消费而非生产（Lefebvre, 1984: 60），日常生活正是这样一个能够生产出统治力量的消费领域，列斐伏尔借此完成了他个人思想的消费转向（我们将看到这一转向对于语言和符号的强调则表明它在根本上也是一种文化转向，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此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的交集）。

在列斐伏尔有关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一种语言转向，这一转向无疑顺应了 20 世纪西方思想的一股重要潮流，那就是语言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符号学的兴起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

---

<sup>①</sup> 这一观点虽然与哈贝马斯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对生活世界拓殖的论调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它们同样有着许多差异。与我们此处的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个差异就是，哈贝马斯所谈论的是系统的控制对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的规范同一性的破坏和取代的问题（哈贝马斯，2000：105—106、106、107—108、108），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所谈论的是系统的控制不需要也不考虑生活世界的问题；而列斐伏尔所谈论的则是作为基础层次的日常生活的异化问题，是新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现代技术和官僚制度对作为其自身基础的日常生活的异化改造和总体性同化的问题。

领域中推动了一股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不仅是对于含义的重要性，更是实践的重要性）、甚至将语言本体论化（如在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那里）的思想潮流。列斐伏尔的语言转向是通过描绘客观实在的参照物的消失，进而指出语言对参照物的建构和语言的霸权而呈现出来的（Lefebvre, 1984: 112、113、118、119、120）。列斐伏尔认为，在1905至1910年左右，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变迁的影响，一系列传统的参照物（referentials）瓦解了，曾经被人们所信仰的有关绝对实在（absolute reality）的常识概念也随之消失，功能的和技术的对象取代了传统对象的地位，对象与符号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于是对象在实践中变成了符号（signs），而符号则变成了对象，由此人类所建构的第二自然取代了绝对的第一自然的地位，可知觉的实在的参照物消失了（Lefebvre, 1984: 113）。随之而来的是，当言语（speech）和形象（image）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结构的错觉的时候，参照物缺失的后果就变得更加严重了，此时形象显现为参照物，尽管它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功能（Lefebvre, 1984: 118）。形象之所以能够显现为参照物，就在于形象总是和言语彼此呼应，形象为言语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不确定的和多样的空间，正是言语为形象建构起（能指的）含义，这些含义充当了所指的角色。但是“正当形象需要一个支撑的时候，言语却悬在空中，并显得被形象所支持；但言语也无所依靠”（Lefebvre, 1984: 118）。由此，列斐伏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场语言的游戏。传统参照物的衰落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彼此分裂，所指不再具有一个绝对实在的参照物作为自身的依据，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传统联系被打断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高度技术性和功能性的对象不再具有绝对实在的特征，它们的符号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符号特征的能指所指向的所指及其对象不过是一些语言的建构，而后者则成为了最终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赢得了霸权的地位，因为正是语言重新建立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这一配对的工作意味着权威（Lefebvre, 1984: 119）。语言腐蚀并替代了参照物，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即为语言确定规则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废弃并消解了参照物，参照物越是变得模糊不清，元语言就越是清晰和意义重大（Lefebvre, 1984: 129），它不断地从参照物的手中夺取对能指的支配权，正是在元语言兴旺的地方，它所支配的语言和言语才作为参照物发挥作用（Lefebvre, 1984: 129）。这个元语言的统治使我们陷入了空虚之中，所不同的是这个空虚充满

了符号 (Lefebvre, 1984: 135)。到此, 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也就是一个语言和符号所统治的社会, 这是一个真实在其中被瓦解和隐退的社会, 因为这个社会的真实不过是一种语言的建构, “故事不必是‘可信的’; 可信性已经同参照物一同消失了, 这对于一种自在的感觉和语言的自由做出了贡献。如果有一个共同场所的话, 它就是日常生活, 从那里我们乘着语言的翅膀展翅翱翔” (Lefebvre, 1984: 139)。

事实上, 对列斐伏尔有所影响的罗兰·巴特在其对大众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中就已经提出了参照物消失的论断: “流行只有通过它自身才能确定, 因为流行只是一件衣服, 流行服饰只不过是流行决定它为时髦的东西而已。因此, 从能指到所指, 一个纯粹的自反过程是建立在所指不断空泛的过程中, 也可以说是内容空泛的过程中, 但这一过程丝毫不会放弃它的意指力量。在这一进程中, 衣服是作为某一事物的能指而构建起来的, 但这一事物却不过是这种构建而已” (巴特, 2000: 319)。作为参照物的绝对实在的事物在此并不存在, 流行只是自我指涉、循环论证, 而事物的缺失所留下的空虚则被语言所填满, “感知某物所要表达的意义, 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语言的分解: 意义只在于指称, 而所指的世界不过是语言的世界” (巴特, 1999: 3)。这至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说明了, 为什么巴特在研究流行服饰的时候却将关注点放在了流行杂志中的书写的时装上 (巴特, 2000: 2), “没有话语, 就没有完整的流行, 没有根本意义的流行, 因而, 把真实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 实际上, 真正的原因是促使我们从创建的话语走向它构建的实体” (巴特, 2000: 3)。话语的建构暗示了书写 (writing) 的重要性, 这一点被列斐伏尔加以系统地阐发。在列斐伏尔看来, 对符号消费的日常生活世界加以组织和控制的官僚统治机制正是以书写为其权力的基础 (Lefebvre, 1984: 159)。对人口的科层化管理、将人民训练成官僚以便于整合、对日常生活的科层式管理、以及依据特定的标准而对私人生活的工具理性化等等, 都无一例外的要依赖于通过对资料的调查和整理所建立起来的书写系统, 书写的话语生产出异化统治的权力, 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 但这的确在某些方面与福柯有关话语/权力的工作产生了共鸣。列斐伏尔明确地指出: “一个建立在书写和写下的东西之上的社会趋向于恐怖主义, 因为那个阐释被写下的传统的意识形态为说服增添了恐吓” (Lefebvre, 1984: 156)。在列斐伏尔看来, 书写既是一个社会性的

客体也是一种理智的记忆，它暗示了命令和权威，它是重复的和积累的，它总是冷漠地强迫对它自身的重复（就像科层组织中的规章制度那样），因此它象征着刻板和压迫。而这正是一个恐怖主义社会的特征。

对列斐伏尔而言，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同时也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terrorist society）。“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是一个**过度压抑社会**（over-repressive society）的逻辑的和结构的后果；强迫与自由的幻觉聚集在一起；未被认出的强迫包围着各种共同体（及其个体成员们）的生活，并根据一个普遍的战略将它们组织起来；在**他者导向的**（other-directed）和**内心导向的**（inner-directed）良知之间的区别被废除了，因为现在扮演**内心**角色的是伪装的、整合的、正当的**他者**；对立被迫保持沉默，这或者是通过将其谴责为是一种败坏并因此而使之无效，或者是通过整合来实现的”（Lefebvre, 1984: 147）。总之恐怖主义社会的恐怖是弥漫的，它对应着一个试图包罗整个社会的普遍的战略，它的压迫是从所有的方面施加于个体成员的，这是一种试图加以总体化的战略；恐怖主义社会的暴力是伪装和隐蔽的，并被赋予了一种合法化的表象，仿佛它就是人们内心的良知，因此它并没有被那些受害者所认出，它甚至将每一个受害者都不知不觉地转变为恐怖主义者，他们自我强迫、自我告发、自我惩罚，成为被控制的个体，为将他们置于异化之中的当权者的目标服务。这是一个对异化高度无意识的异化的社会，无意识的特征意味着这是最坏的异化（Lefebvre, 2002: 208），它试图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反对他自身，“异化呈现在每天的生活中，呈现在无产者的生活中，甚至呈现在小资产者和资本家的生活中（差别在于资本家与异化的非人化的权力相互勾结）”（Lefebvre, 1991a: 167）。而这个恐怖主义的社会正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组织（这也正是它的目标所在）之上的，恐怖正是这一组织的结果（Lefebvre, 1984: 148）。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的消费是被控制的消费，这一控制不仅意味着对消费对象的选择的控制，同时还意味着对通过消费所获得的满足的控制。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控制使消费者受制于广告、营销机构或各种社会威望的要求，使他们从属于异化需要的奴役和统治。其具体的表现就是用固定的需要（fixed needs）来取代欲望（desire），用程式化的满足来取代快乐（delight）（Lefebvre, 2005: 27）。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和马尔库塞有关单向度社

会的理论。对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而言，作为工具理性之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正是通过应付、生产和控制大众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统治和压迫（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3：161、172、173）。而马尔库塞有关工具合理性的“虚假意识”被宣称为真实意识的论断（马尔库塞，1988：11）则很可能影响了列斐伏尔有关异化需要的理论（刘怀玉，2006：269）。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列斐伏尔与霍克海默等人之间的诸多差异，其中之一就是列斐伏尔并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那样将其批判引向一种单向度社会的悲观论调（Lefebvre, 1984: 66）。

有关各阶级在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列斐伏尔像绝大多数消费社会理论家一样特别强调了中产阶级。尽管对列斐伏尔而言，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整个社会而言的（Lefebvre, 2005: 26），但是中产阶级却构成了异化操纵的轴心和支撑，构成了这些操纵的主体和客体（Lefebvre, 2005: 26—27），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就在中产阶级中（Lefebvre, 2005: 157）。中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它自身的异化，它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异化战略的走卒（Lefebvre, 1984: 94）。中产阶级无疑是西方消费社会理论所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这显然与中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正如受到列斐伏尔影响的布希亚所指出的，处于社会流动和成长之中的中产阶级热衷于通过消费物来表达自身试图进入更高社会等级的愿望，然而通过消费物所实现的符号的胜利却秘密地宣布了中产阶级的失败（Baudrillard, 1981: 40），因为真正的权力并不存在于符号的消费中，消费制造了虚假的平等，其民主的表象不过是一个幻觉（Baudrillard, 1981: 50、60、62）。然而中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幻觉的实质，他们由此而沦为了异化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一方面是消费的主体，是异化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异化的对象，在符号的消费中被异化。列斐伏尔还进一步指出，与资产阶级相比中产阶级财富贫乏、没有权力和权威，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甚至他们逃避此种生活的方式都是高度一致的（由旅行社所组织的包办旅游），这使得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在发生着缓慢的合并（Lefebvre, 1984: 93），而这无疑更加肯定了中产阶级的符号幻觉。总之在列斐伏尔看来，中产阶级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价值和文化，他们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盲从的消费者，他们甚至缺乏一个统一的原则，只不过貌

似具有一个同质的整体，而实际则处于分化的状态，存在着不同等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使得中产的阶层和阶级（middle strata and classes）饱受错位和瓦解的威胁。总之这些中产的阶层和阶级规划了一条通向衰落的道路（Lefebvre, 2005: 159）。

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理论充分展现了列斐伏尔有关日常生活的层次性和异化的思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个被控制了消费的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官僚统治的基础和焦点，日常生活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层面，日常生活的符号化消费以及作为这一消费的主体的中产阶级被诠释为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基础。列斐伏尔以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向我们展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无意识特征及其不言而喻的表象所掩盖的恐怖和压迫，日常生活那平凡和琐碎的外表恰恰是这一无意识恐怖的最佳虚饰，当社会学研究将日常生活作为无足轻重的领域加以忽视的时候，列斐伏尔的研究则表明这一忽视恰恰是与日常生活的恐怖主义合谋。必须将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重新的反思，<sup>①</sup>必须与那个我们过于熟识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sup>②</sup>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再被日常生活那过于熟悉的平庸外表所迷惑，从而发现一个充满了陌生和神奇的日常生活。

<sup>①</sup> 这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视为是一个一致性的系统，恰恰相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系统（Lefebvre, 1984: 97—98）。列斐伏尔反对将现代社会视为是一个整合的系统，仅仅存在着许多子系统（sub-systems），它们并非存在于一个单一的系统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不同层次中（Lefebvre, 1984: 98）。诸如时尚、烹调、旅游、文化、性和色情、汽车等等都可以成为这里所谓的子系统，它们各自有其形式化的、独特的、专门化的活动和目的物（objectives）以及由活动和目的物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处境；它们能够促进等级制度的形成，这是以在国家层面或由国家所发起的制度层面彼此辩护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为条件的，例如根据汽车的尺寸、马力、成本甚至对汽车的操控所形成的等级，以及此种等级和社会地位等级之间的相互类似的而非完全一致的关系；最后它们是以能够确保活动间的沟通的文本（texts）为基础的，它们是高度符号化的，那些文本有的时候会组织成编码规则（codes），例如小汽车是一个地位的象征，除了它的实用功能之外，它还被人们作为符号来消费，而围绕汽车则组建起一个庞大的编码系统，它包括公路信号、法律文本、广告等等。总之列斐伏尔拒绝像结构功能主义者那样将社会系统化，“已经不存在本质统一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而只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理性化与功能化的体系，诸如服装、旅游、烹调、饮料、化妆、影视、住房等等这些将日常生活肢解成为成千上万个局部碎片的体系或体制”（刘怀玉，2006: 297）。然而这一拒绝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革命诉求，它意味着日常生活不可能被异化的统治彻底吸收，我们将在第六节阐明这一点。

<sup>②</sup> 当然这本身就需要某种日常生活世界的奠基，这表明我们不可能彻底地摆脱那种不言而喻的熟识状态，对日常生活的反思依然需要某种日常生活的基础（有关这一问题可参阅郑震，2009: 第二部第一章）。因此当我们谈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反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将日常生活加以完全地对象化，我们所谓的“整体”只是相对而言的（更何况日常生活的奠基表明一切认识活动都有其社会历史的条件或局限性，因此不存在对整体的绝对把握），这也暗示了反思日常生活世界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

## 五、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

晚年的列斐伏尔并没有停止其变革的步伐，他认为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目的地和意义，城市化及其问题已经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因素，工业化只能在城市化中找到它的实现 (Lefebvre, 1984: 47、135、195)。这一时期列斐伏尔的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为：“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空间的组织首要地与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相关联。与此同时，这些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生存的主要基础” (Soja, 1989: 91)。由此列斐伏尔展开了其日常生活批判的空间转向，这一转向为其在当代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以至于人们常常只是将他视为是一个空间理论家，从而遗忘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然而此种割裂只能导致对其空间转向的误解。

试图在这里有限的篇幅中系统地阐发这一空间转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将致力于把我们前文所发展的思路在列斐伏尔的空间语境中加以概括性的重建，从而揭示这一转向对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意义。对列斐伏尔而言，空间转向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这个微观层次的基础地位 (Lefebvre, 1991b: 366)，只不过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和异化特征经历了一种空间本体论的转化，以至于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体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加以控制的对象，而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则在本体论上被解释为一个抽象的空间 (abstract space)。对于列斐伏尔而言，抽象空间是一个高度异化的符号统治的空间，它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形象和符号，而这一世界中的自我则丧失了与其本性、与物质世界、甚至与物(商品)的“物质性”(thingness)之间的联系 (Lefebvre, 1991b: 311)，他被符号的虚构所包围和吸收，连他自身也被符号所取代，以至于剩下的不过是一个自我的形象(一个异化的自我)。这个形象与符号的世界总是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的(real)”转移开去，也就是从可能的(possible)转移开去 (Lefebvre, 1991b: 389)。因为超越异化的可能性正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之中，而意识形态的符号表象正是要掩盖现实本身。在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的理论中所展现的语言和符号的异化统治在此得到了一个空间化的表述，当形象和符号的世界占据空间的时候，它用一个精神的、因此是

抽象的空间来取代空间的实践，它只是在形象和符号的抽象中营造一种统一的表象（Lefebvre, 1991b: 389），而它的同一性的表象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幻觉（Lefebvre, 1991b: 285、287、308）。列斐伏尔写道：“在知觉领域中的关系并不反映社会关系本身——相反，它们掩饰后者。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在感觉的一肉体的（或实践和知觉的）空间中是不可见的”（Lefebvre, 1991b: 211）。这个日常生活的符号空间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象来掩盖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从而以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来强化资本主义的官僚统治权力，在此意义上空间的生产已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在异化空间的生产中被隐蔽地加以实现的。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既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前提，也是它的一个结果。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固有地存在于财产关系中（尤其是关于土地和地产的所有权关系中），并且与生产力（它将一种形式强加于那个土地或地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Lefebvre, 1991b: 85）。如果考虑到这一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以及它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那么其赋予社会空间的本体论地位则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空间并非只是一种派生的现象，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而言具有基础的重要性。列斐伏尔进而指出：“尽管它（指社会空间——引者注）是被使用的**产品**，被消费的产品，它也是一种**生产的手段**；交换的网络和原材料与能量的流塑造了空间，同时也被它所决定”（Lefebvre, 1991b: 85）。

当人们在娱乐场所中休闲的时候，当人们作为政府资助的住宅计划的承租人的时候，或者当人们作为高速公路的使用者和商业街区中的购物者的时候，他们的日常实践正在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中。商业区、住宅楼、高速公路、机场等等空间性的社会构成物无不体现着土地和地产的所有权关系，它们体现了以城市规划专家、科学家、技术官僚等人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化的官僚统治力量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展开的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符号建构与强制。当现代个体置身于这些空间构成物之中，沉浸在各种符号的虚构之中如鱼得水的时候，他们作为空间的使用者以其自身亲切而熟悉的日常实践不断地再生产着抽象空间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以其自身异化了的空間需要推动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再生产，此种城市化的进程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官僚统治制度，并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异化。

日常生活依然是批判的焦点，只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空间的消费成为了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社会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工具也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它又显示为一种欺骗性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总之社会空间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分法，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本体，其生产的关键依然扎根于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明确指出（Lefebvre, 1991b: 232—33），亲切熟悉的日常实践正在不断地将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地图和城市规划，交通和沟通系统，由形象和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归属于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自然、富饶），<sup>①</sup>这种不断的关联扮演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角色，它取代了任何明确的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空间是一个陷阱——就它逃避直接的意识而言就更是这样了。

列斐伏尔晚年的空间本体论转向无疑丰富和发展了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社会学中的客观环境的空间概念和现象学的主观空间论，驳斥了社会学中的普遍主义、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立场，推动了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和变革（郑震，2010）。然而，列斐伏尔在批判现代社会空间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现代社会时间这另一分析维度的反思和批判，他依然深陷于时空二元论的桎梏之中，他对现代空间的优先性的强调（Lefebvre, 2005: 71）以及将现代社会中的时间和空间在相互作用中彼此对立的作法都只不过是自己的独断偏见（郑震，2010）。与此同时，列斐伏尔赋予空间的本体论地位仅仅是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言的，社会实践的更为广泛的空间本体论意义尚未得到探讨（郑震，2010），更不要说建构一种超越时空二元论的时空本体论了。

## 六、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

<sup>①</sup>如果说空间的表象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各种空间性的知识符码及其相关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统治的空间的话（Lefebvre, 1991b: 33, 38—39），那么表现的空间则意味着对反抗空间表象的空间真理的亲身体验（郑震，2010）。不过列斐伏尔认为，在抽象空间中表现的空间和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实践是社会空间的物质建构的维度，它是对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尤其是土地和地产所有权的社会构成物（如住宅、商业街区、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等）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既是这一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其结果”[郑震，2010]。）都被空间的表象所支配和吞噬（Lefebvre, 1991b: 398），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下一节的讨论将说明这一点）。

尽管列斐伏尔为我们描绘了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强调了现代官僚统治机制在一种总体化的倾向中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控制，乃至现代社会空间的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特征。但是列斐伏尔从未将日常生活的异化视为是一个绝对总体化的现象，“绝对异化和绝对非异化是同样无法想象的”（Lefebvre, 2002: 207）。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依然存在着不可还原的东西，存在着矛盾和反对，它们介入并阻碍着线路的封闭，使结构分裂（Lefebvre, 1984: 75）。尽管日常生活有其作为形式化的技术—官僚统治机制的产物的一面，但是异化的统治并不能够将日常生活彻底地吸收和同化，因为日常生活不仅仅是产品（product），它同时也是剩余物（residue），剩余的和不可还原的日常生活能够躲开所有制度化的企图（Lefebvre, 1984: 182），由此便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双重特征：产品和剩余物，换句话说异化的产物和非异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列斐伏尔终其一生都坚持马克思有关哲学的问题不只是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995: 57）的信条，“目标在于使思想——人的力量，参与并意识到那个力量——介入到生活的最细微的细节之中。……目标是去改变生活，明确地去重新创造日常生活”（Lefebvre, 1991a: 227）。“研究日常就是希望去改变它。要改变日常就是将其混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置于语言之中；是将其潜在的冲突加以显明，并因此去将它们打得粉碎”（Lefebvre, 2002: 226）。由此列斐伏尔的独特之处也已经昭然若揭，对列斐伏尔而言，社会的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形式和经济关系，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变革，那么革命极有可能陷入颓败（Lefebvre, 2005: 29）。列斐伏尔主张变革必须是总体上的，政治和经济的革命必须与日常生活的革命一同进行，革命必须从日常生活这个基础层面入手，否则就难免失败的命运。事实上，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也正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创造的动力正是产生于日常生活，这也就是作为剩余物的不可还原的日常生活，它意味着日常生活绝非社会变迁的一个次要的或被动的领域。

列斐伏尔反对以一种宿命论的方式来谈论革命和解放，仿佛一切都只是在一种机械的必然性中走向预定的目标。相反任何群体都有其不得不加以面对的相对不确定的未来，它们以相对明确的方式为这一未来做出准备（Lefebvre, 2002: 133—34）。当然这一不确定性也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偶然性，日常充满了必然性、偶然性、自由、危险、确信、风险和安全的混合（Lefebvre, 2002: 138）。变革日

常生活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不同于统计的或然性(statistical probability),后者以过去为基础来进行预测,而可能性并非根据过去所做出的对未来的推断,它是经动机激发和思考而做出的集体选择所带来的社会历史的非连续性(Lefebvre, 2002:111、112、113)。对列斐伏尔而言,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必然的,它承载着一种对总体性变革之必将到来的乌托邦的信心(列斐伏尔并不否认其总体性革命实践的理念是乌托邦的),在众多的可能性中对变革日常生活的历史“时刻”(moment)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做出选择的人们认出了这一时刻的存在(Lefebvre, 2002: 137—38),选择需要主体的努力,因此革命之可能性的实现并非作为绝对的客体强加于人,但选择并不基于对时刻的预见,这一无知也否定了绝对主体的存在,列斐伏尔试图以此来超越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他描绘了一种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因此这一颠覆性时刻的到来又是不确定的,它仅仅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人们并不能够从过去之中预测它将于何时何地到来。列斐伏尔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必然与偶然混合在了一起,而这个承载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可能的时刻正是出生于日常并存在于日常之中(Lefebvre, 2002: 351),尽管作为超越日常生活的行动之可能性的时刻并不能够由日常来界定,它同样也不能够由例外的和外在于日常的东西来界定(Lefebvre, 2002: 356)。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并不存在绝对的非异化,异化与非异化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任何非异化都可成为新的异化,因此“时刻”固有地具有如下的特征:“失败必须被视为是目标而非起点”(Lefebvre, 2002: 351)。

这一反科学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被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欲望理论和节日狂欢推到了极致。针对现代人的异化了的需要,列斐伏尔提出了不可被异化统治所吸收的欲望,他认为欲望不会在强加的条件下兴旺,因此,欲望的这种不可还原性使得社会的和理智的系统化试图将欲望还原为异化需要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Lefebvre, 1984: 172)。对列斐伏尔而言,欲望是与同工具理性和技术官僚统治相对立的自发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不过是欲望的另一个名称(Lefebvre, 1984: 174)。欲望与理智的操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反对技术—官僚机制所强加的控制,它反对书写的重复,它在反抗书写、元语言和空间霸权的言谈和时间中被发现,它从来不在空间和书写以及任何空间的所指中被发现(Lefebvre, 1984: 182)。在一种积

极的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是欲望的时间（Lefebvre, 1984: 182）。异化了的日常生活始终试图使欲望窒息，但欲望又来自于日常生活，这便是我们前文所揭示的日常生活的两重性，正是欲望的冒险才能够将颠覆的可能性带入现实之中，也正是欲望的冒险才能够颠覆那个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同样也正是欲望的冒险才能够将日常生活转变为一场象征着自由和解放的节日狂欢。

将变革日常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的欲望造反，而这个欲望的存在又诉诸于某种从未被明确地加以界定过的人性的假设（Lefebvre, 1984: 193），这使得列斐伏尔的解放政治陷入到一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困境之中，这也正是他的异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在处理尼采权力意志哲学遗产的问题上，列斐伏尔与德勒兹和加塔利一样都陷入到一种欲望的形而上学之中，虽然他们的实际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把颠覆压迫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无法被经验加以验证的欲望概念之上，无论是列斐伏尔的欲望的时间还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机器（Deleuze, Guattari, 1984: 284、285、285—86）都无法摆脱一种基于想象的尴尬。可以说当福柯在欲望问题上与德勒兹划清界限的时候（Foucault, 1997: 446），他同时也已经隐晦地同列斐伏尔的欲望理论划清了界线。不过福柯消除欲望的主体价值并将其归属于权力建构的做法的确过于消极（这里仅涉及福柯的前期思想），事实上，列斐伏尔的问题不仅在于对欲望的超越性持有一种盲目的信仰，更在于他没有能够为这一超越性找到合理的范围和解释（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想象的作为社会历史性建构的超越性并非是不可想象的。而欲望只能是一种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社会历史性地形成的生产性的经验现象，它既可以同颠覆压迫的超越性联合，也完全可能为压迫的力量服务[郑震，2009：315—37]。）。同样，当列斐伏尔将口头的言谈与书写对立起来，将时间和现代空间对立起来的时候，其理论的非反思和论证的薄弱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以言谈和书写的对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此种对立的论调显然受制于一种理想化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人们充其量只能论证特定的言谈和特定的书写之间的对立。一味地将书写视为是一种压迫的力量，而将言谈视为是解放的潜能所在，其实质是无视言谈和书写在本质上并无必然的区别，它们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任何言谈都可以转化为书写的形式，而任何书写也同样可以生产出言谈。真正的对立并不存在于语言的形式之中，而是存在于各种话语所诠释和承载的不同群体

的利益和立场之间。即便书写的确更有助于制度化的统治机制的建立（如法律条文、书面规章、档案记录、经典教义等等所发挥的作用），但制度化并不必然或者说并不总是意味着压迫，更何况书写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一篇论战的檄文、一篇革命的宣言等等），只不过正如列斐伏尔本人所意识到的，任何颠覆的成果都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力量，就如同任何压迫都可能孕育出超越的可能。相比之下，尽管言谈本身并不具有书写在规范化和制度化方面的那种优势，但没有理由认为言谈因此就更加接近一种反抗压迫的状态，口头的言谈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书写的另一套语言体系，如果一种特定的言谈蕴涵了解放的潜能，那么它同样也可能堕落为一种压迫的力量，就此而言它并不比书写更加得优越。总之简单地将言谈和书写加以对立只能造成一种误导，它无视具体的言谈和书写的社会历史特征，也无法准确地体现出真正的社会对立和斗争。

而当列斐伏尔将革命理解成节日狂欢的时候，其社会变迁理论的不切实际和乌托邦的空想则暴露无遗。<sup>①</sup>尽管如此，当列斐伏尔指出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这对于忽视日常生活的主流社会学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将日常生活视为是变革的可能性的来源与将日常生活视为是基础性层次的观点是彼此协调的，正是在看似平凡琐碎但却广泛细致且影响深远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变革社会的巨大潜能。

## 七、结束语：迈向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西方世俗上层的行为方式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日常生活正是这些变革发生的场所（Elias, 2000:170），这些变革的速度是如此的缓慢，以至于只有在长达几个世纪的长时段中才能够显示出其巨大的变化。这一点至少部分地佐证了列斐伏尔的如下论断：“日常生活很可能是变得最缓慢的东西，并且一旦它遇到任何困难，它甚至可能再一次采用旧的形式，回到陈腐的老一套中去”（Lefebvre, 2002: 34）。这也

---

<sup>①</sup> 详细地介绍这一乌托邦式的节日概念对于我们的主题并无多少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列斐伏尔的节日思想无疑是尼采式的身体欲望的酒神精神和试图在日常中发现奇迹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对中世纪狂欢节的怀旧情绪的混合产物（海默尔，2008：196、206）。

许正是日常生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似乎总是在机械地重复各种例行化的过程，仿佛它所包含的仅仅是单调和重复，以至于变得平凡和乏味，然而这也许正是日常生活为人们所制造的众多错觉中的一个，正是这些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变革彻底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过日常生活变革的缓慢显然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相对于现代生产技术的变革），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短短几十年中变革之迅速便是一个明证，不过即便如此，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此种变革依然还是显得难以察觉，毕竟日常生活的转变很少像现代生产技术的变革那样触目而突显，日常生活的变革很少以轰动视听的方式摆在每一个日常之人的面前，它更多地只是在每天看似重复的各种活动之中发生的微妙的转换，<sup>①</sup>而也正是此种微妙而不突显的过程参与铸就了日常生活的貌似不言而喻的信念（一切仿佛都是从来如此的，一切仿佛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相对缓慢而隐蔽的变革以及那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对老一套的重复恰恰助长了最顽固的惰性，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急剧变革的阻碍。也许正是因此一种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才显得更加得迫切，揭开日常生活那欺骗性的外表以洞见人之存在的根基无疑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一任务不能满足于仅仅关注日常生活的局部，或者将日常生活加以割裂和分散地考察，以至于用各种专门性的社会学问题或分支社会学来肢解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例如所谓的消费社会学、闲暇社会学、

<sup>①</sup> 之所以我们没有使用绝对的话语来陈述这一观点，就在于我们并不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着触目而突显的急剧变革。但是，我们认为日常生活的变革依然是以微妙的转换为其主导特征的，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保证之一。让我们以电视机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例，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且广泛地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无疑是一个触目而突显的事件，而电视机对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改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由电视机的引入所引发的相关日常生活信念的变革与建构是不可以仅仅用电视的轰动到场来加以解释的，换句话说，电视对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人们在很长的时期中几乎每天都重复进行的与电视有关的活动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微妙影响来加以解释（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媒体机构、政府和电视机的生产与销售企业等方面在其中所发挥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正是此种微妙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参与铸就了使用电视的日常生活，其所包含的各种不言而喻的信念正是在此种不触目的群体活动中被加以最大限度地建构和维持。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地用于解释广泛的社会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在此我们在分析上悬置了日常生活对社会革命的推动和建构作用），例如，以1949年为时间标志的社会变革无疑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但这一日常生活的变革显然不能仅仅通过触目而突显的新制度的颁布和旧制度在法律上的废除来加以解释，只有通过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所长期重复的承载着新的社会制度规范的实践的建构（政府的制度化机制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新的不言而喻的日常生活世界才可能真正地被建立起来（当然许多旧的信念依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保持或重构，这也体现了日常生活变革的复杂性）。感谢本文的匿名审稿专家对这一注释的相关正文所提出的疑问，正是这一疑问促使我撰写这一注释来进一步地表明我的观点，以充实过于简要的正文。

媒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婚姻问题研究、亲子关系研究、养老问题研究、流行文化研究、人际关系研究等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理解和反思日常生活乃至现代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但是一门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却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局部思考的状态，它必须将充满了异质性的日常生活作为现代社会之中的一个整体性的层面来加以关注（不是系统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而是相对于特定社会的普遍的奠基性意义上的整体性，即作为一个奠基性的层面意义上的整体性），对日常生活的局部的考察始终是为了促进对日常生活整体的反思而展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洞见日常生活对于现代人之存在的基础意义，才可能清晰地展现日常生活对于现代社会总体的基础性地位，也才可能充分地把握住日常生活所隐含的压迫的现实性和颠覆的可能性。毕竟任何局部的研究往往易于将人们引向各种专门化甚至抽象化，从而忽视了将这些人为提取的方面重新置入其所来自的那个日常生活的整体，以促进对这个整体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的，反思所把握的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整体）。日常生活的异质性并不是将日常生活彻底割裂为许多互不相关的领域的异质性（这一异质性向疏远、陌生、并置、交错、联合、对立、乃至斗争等各种状态敞开），它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人群和不同活动之间的异质性，它构成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纷繁多样和千变万化的面孔，但这一切都不能否定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生活之基础层面的事实，正因为这一基础层面本身是异质和多样的，社会生活才显现出不同于系统论意义上的系统的复杂样态。因此，我们不能将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仅仅视为是一门普通的分支社会学，日常生活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个生产性和奠基性的层次，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其实质也就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所展开的对于社会总体的研究，日常生活的意义是总体性的意义，对日常生活这个基础层面的反思和批判，不可能不是对于社会总体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我们也无意于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同于整个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并不等于日常生活社会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并不能够取代那些关于高等社会层次的社会学（如科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但后者必须以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为其内在的前提和基础，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主导的视角，毕竟日常生活世界正是蕴含着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历史存在的世界，对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反思和批判无疑是社会学所不可推卸的任务。

那么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批判是否只能采用一种异化的理论作为其基础？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已经指出了列斐伏尔有关异化和总体人的思想所带来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它们充分地揭示了异化理论无法支撑起一种合理的批判框架。社会学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必须在经验事实所包含的矛盾中寻找批判的切入点，它意味着批判仅仅是出于对事实的自相矛盾的不满而做出的社会历史性的选择，而不是因为现实偏离了某种有关人性的形而上学的假设，社会学的批判必须排除任何意义上的此种假设，一种绝对的本真性是无法在经验上被加以证实的。那么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矛盾的切入点的把握，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日常生活最大的自相矛盾就是其在意识层面的貌似不言而喻的特征和无意识（就列斐伏尔赋予该词的含义而言，参阅本文的第二节或 Lefebvre, 1984: 117）层面的社会历史性的建构与压迫，换句话说，日常生活奉行着双重的原则，这类似于布迪厄所谓的难以团结一致的实践的双重真理性（Bourdieu, 1998: 95），即由无意识所制造的意识的幻觉和以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实际支配的社会历史法则。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揭示了一种社会的暴力，它意味着在人们所以为的和他们实际所是的之间存在着矛盾，它意味着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实际处境，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信仰的现实并不像它看似的那样理所当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我需求可能包含着一些伪装了的压迫力量，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看似自发的需求可能包含着在他们充满错觉的合谋中强加的暴力，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自身的存在以最基本的方式合法化了这些剥夺和压迫他们的社会不平等。总之只要日常生活依然奉行着这样的双重原则，一种批判的可能性就已经向我们敞开，它最大限度地将自身奠基于经验的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奠基于对经验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它当然需要一种规范性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无疑是从现实所隐含的自相矛盾入手，它批判这一矛盾状态的欺骗性和暴力特征，它力求为人们揭示这些欺骗和暴力，由此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将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启蒙，<sup>①</sup>在对日常之人的唤醒中激活日常生活变革的动力，至少对存在的觉醒为对存在的选择提供了可能。

---

<sup>①</sup> 正如列斐伏尔的思想所表明的，任何批判都不能自诩一种绝对的启蒙，而这一启蒙的可能性也正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如求知欲所包含的怀疑倾向便是催生启蒙的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 巴特, 罗兰, 1999, 《符号学原理》, 王东亮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 , 2000,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 敖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哈贝马斯, 尤尔根, 2000,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郭官义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 霍克海默, 马克思、阿道尔诺, 西奥多, 2003,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海默尔, 本, 2008,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 王志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胡塞尔, 埃德蒙德, 2001, 《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怀玉, 2006, 《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马尔库塞, 赫伯特, 1988,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张峰、吕世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马克思, 卡尔, 199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200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郑震, 2009, 《身体图景》,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 2010, 《空间: 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by Charles Levin, Telos Press.
- Bourdieu, P. 1998, "The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 Trans by Randal Johnson. in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eleuze, G., Guattari, F. 1984,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London & New York: The Athlone Press Ltd.
- Elias, N., 2000,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 Foucault, M. 1997,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Trans by Jeremy Harding. in Faubion, D. James (eds.), *Michel Foucault (Vol.2):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New Press.
- Lefebvre, H.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1a,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1): Introduction*. Trans by John Moor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1991b,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Trans. by John Moor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3): 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 (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Trans.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Soja, 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 可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http://www.sociology.cass.cn)